

◎ 兰亭文化研究

第二册

陈浩主编



当代『兰亭序』真伪论争文选

毛万宝编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绍兴文理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 兰亭文化研究

第二册

陈浩主编

当代『兰亭序』真伪论争文选

毛万宝编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兰亭文化研究. 第2册, 当代《兰亭序》真伪论争文
选/陈浩主编.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9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ISBN 978-7-5340-3030-7

I. ①兰… II. ①陈… III. ①兰亭序—研究②兰亭序
—鉴别—文集 IV. ①J2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7542 号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兰亭文化研究 第2册 当代《兰亭序》真伪论争文

主 编 陈 浩
编 著 毛万宝
责任编辑 骆振龙
装帧设计 宗 情
责任校对 黄 静
责任印制 陈柏荣

1965 年以来兰亭论辨之透视

(代自序)

兰亭论辨发端于 1965 年,应该说,这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因为,1965 年的中华大地,特别是文艺界与学术界到处都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空气,预示着一场狂虐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原本不可能再出现诸如兰亭论辨之类的“百家争鸣”局面,但偏偏有个通天人物得到了一个“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最高指示”,迅速导致兰亭论辨异军突起,轰轰烈烈地全面铺展开来。“百花尽杀我独开”,这难道不是一种地道之幸运么?

然而,由于特定时空、特定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客观规定,厄运还是不可避免地逼向兰亭论辨。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暴毕竟“史无前例”,仅靠一句“最高指示”提供的保护伞,已经彻底地无济于事,终于,在持续将近半年时间之后,兰亭论辨便宣告夭折,它的再度兴起竟要等上整整十多个年头。这显然表明,幸与不幸,对兰亭论辨而言,前者只是偶然的、短暂的,而后者才是必然的、长时间的。

如果把兰亭论辨在 1965 年的短暂繁荣称作第一次高潮的话,那么在“文革”结束之后出现的再度繁荣即可称为第二次高潮。潮生潮灭、潮起潮落,使我们从中真切感受到了社会政治文化对学术研究的巨大钳控能量,同时,也在客观上有力印证了拿破仑曾说过的一句名言:“政治,是近代任何领域无法躲避的东西。”因此,我们今天在称道兰亭论辨第二次高潮丰硕成果之际,亦应感谢取得这丰硕成果所必需的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

为帮助广大读者充分认识兰亭论辨这一当代书学史上的学术现象,本文将对兰亭论辨的概况、议题、特点、意义与失误等试作一番尽

可能深刻全面的透视与介绍。

据史书记载,东晋永和九年兰亭集会之际,王羲之曾作一序。正是此序,自唐以降成为历代聚讼之公案,开始只是帖本近真问题,迨至清末广东书家李文田,连文章都被列为怀疑对象。时隔七十余年,又有一些当代学者重申与推崇李文田的学术观点。

那是1965年5月,郭沫若根据当时在南京新出土的两方东晋墓志——《谢鲲墓志》与《王兴之夫妇墓志》,撰写了长达两万余言的考据专论——《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为李文田的见解进行实证,力主王羲之的《兰亭序》从文到帖皆系后人伪托,其伪托者即是王羲之七世孙隋代智永和尚。此文先后被当年6月的《文物》与《光明日报》刊载与转载,在整个学术界引起强烈震动。

郭文发表不久,江苏省文史馆的高二适第一个站在对立面的立场表示异议,他于当月完成《〈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随即寄给报刊,以期引起争论,结果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发表。但高二适并不灰心,又将该文寄给自己的老师章士钊,希望得到章的支持和帮助。章接到高文后,感到很为难,要知道郭沫若在当时是个地位显赫的大学术权威,同他进行“驳议”,未免招“蚍蜉撼树”之讥。于是,章又写信将高文转呈毛泽东主席之手。毛泽东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便一面致函给章让章放心,一面致函给郭沫若,劝说郭沫若等人让高文公诸报刊。毛主席的致章、致郭两函是7月18日写的,两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我们要提倡正确地、平等地对待不同意见。各个学派、不同地位的人都应当有同等发表学术观点的权力,都应当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艺术进步和科学发展。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怀、过问下,高二适的文章于7月23日便出现于《光明日报》之上,接着同年7月的《文物》杂志又将高文的手稿全部影印出来。高文的隆重推出,再次引起整个学术界的强烈震动,其程度甚至不亚于郭文之效应,因为这毕竟是学术界极其罕见的“小人物”对“大权威”的一次公开挑战啊!随着高文的亮相,兰亭论辩的对垒双方迅速形成,由于受到特定政治气候、复杂社会关系的影响,其中绝大多数论者都站在维护郭文观点一边,“顺风倒”的现象至为突出,只有唐风、严北溟、商承祚寥寥数人和高文立

场一致。这是兰亭论辨的第一个高潮。遗憾的是,这一高潮未能持续到一年,即因文革风暴骤起而退落下来。

时至1972年8月17日,郭沫若旧话重提,写就《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发表于当月《文物》杂志。其文明确宣称:“《三国志》的晋写本既是隶书体,则其他一切晋写本都必然是隶书体。新疆出土的晋写本是隶书体,则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所谓一隅三反,所谓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而表现,就是这个道理。在天下的书法都是隶书体的晋代,而《兰亭序帖》却是后来的楷书体,那么,《兰亭序帖》必然是伪迹,这样的论断正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也合乎辩证逻辑。”当时,高二适读罢此文,亦感慨万千,立即操笔起草了又一篇反驳性的专论文章——《〈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文末标明的写作日期是当年10月21日。然而,那时学术“百家争鸣”已不复存在,高文根本无法同读者见面,其公开发表一直拖延到1982年第1期的《书法研究》杂志,此时高二适如有冥知定当含笑于九泉之下了。这样,当时的各大报刊就没有出现与郭文意见相反的文章。兰亭论辨终因强大政治寒流的侵袭,失却了重新展开的良好机遇。

值得庆幸的是,1976年“文革”告罄,百废俱兴,举国上下一派勃勃生机,兰亭论辨新的高潮再起有了充分良好的社会环境保证。新高潮中的第一篇文章,即出现于1977年第3期《南京大学学报》之上,作者是南京大学教授侯镜昶,文题拟为《论钟王真书和〈兰亭序〉的真伪》。侯文之后,又有一大批高质量的兰亭论辨文章相继问世。到1981年10月绍兴“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时,兰亭论辨的文章竟可以凭数量的优势被单独列为一个专题小组,由此将兰亭论辨的第二次高潮推向顶端。与第一次高潮形成有趣对比的是人们立场、观点的转换,在第二次高潮中,绝大多数兰亭论辨作者立场、观点均与郭沫若相左,而深信《兰亭序》从文到帖皆系王羲之本人所作;也有少数论者依然坚持当年的立场与观点,且不断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材料替郭文进行辩护,如李长路就是较为突出的一位代表。他在1965年时曾以“甄予”的笔名发表《〈兰亭序帖〉辨妄举例》,1973年写出、1977年发表《〈兰亭〉辨妄举例小补》诸文,近年来又陆续在《书法家》、《岭南书艺》、《郭沫若研究》等刊物或诗或文阐述己见。应该指

出,兰亭论辨第二次高潮中“肯定派”阵营的急剧壮大,既是人们思考趋向多维与成熟的标志,也是人们漠视“权威”、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术性格确立之结果。

以上便是1965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出现的兰亭论辨之概况。

在这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跨度中,兰亭论辨所涉问题的深度与广度,虽不能说“绝后”,但说“空前”却是毫无疑问的。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关于《兰亭序》文章真伪之争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文章命题问题。兰亭修禊,羲之作序,为大家一致公认,然其序文曾否命题,以及命题是什么却成争论对象。郭沫若认为,原序是有命题的,题目就叫《临河序》;但高二适、唐风、商承祚、朱铸禹、侯镜昶、应成一、许庄叔等都一致主张,羲之一序本系稿本,原无题目,今传《临河序》、《兰亭序》、《禊帖》诸题均属后人各以己便随意所加。

第二,文章字句问题。传世帖本《兰亭序》中的字句与刘孝标注《临河序》相较,有诸多不同之处,主要点体现在前者比后者多出“夫人之相与——悲夫”一段167字,少掉“右将军司马——罚酒各三斗”一段40字。由是郭沫若提出:“《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之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与之相对,周传儒则来个彻底反拨,认为“《临河序》是在《兰亭序》基础之上加以删改、移易、缩小而成”的。另外,大家对《兰亭序》中的三个“俗字”(所谓“俗字”即指未被《说文》收入之字)——“暮”、“禊”、“畅”和两个避讳之字——“揽”、“政”,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否定派是王羲之不会用它们,肯定派是王羲之用它们情理双合。

第三,文章风格问题。文艺理论的常识告诉我们,风格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篇文章成熟的标志,那么《兰亭序》文章究竟有无风格可言呢?否定派以未入萧统所编《文选》、不合羲之性格、有悖兰亭诗情调等理由托出自己的看法。肯定派当然不愿苟同,他们说,入《文选》与否不是文章有无价值之唯一标准,《文选》反映选编者的眼光与水平,它代表不了选编对象的实际价值,在我们今天看来,许多进入《文选》者的质量并不怎样,相反未被其收入部分有的却很精彩,《兰亭序》即是未被收入之列中的佼佼者;其次,《兰亭序》的基调与王羲之的复杂性格(旷达与忧患等因素之多样统一)、与部分带有

悲观情调兰亭诗都能做到若契若合、紧相呼应。因而，它是一篇具有鲜明文学风格的力作——“直抒胸臆，情景交融，叙述中有议论，平淡中见奇崛”、“文词清俊，寄意高远，情致起伏跌宕而感慨深沉真切”！

接下来，再看关于《兰亭序》书法真伪之争方面的十个基本问题：

1. 东晋书体问题。这一问题是决定《兰亭序》书法或真或伪的一个重要前提，故而，当郭沫若推出结论“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时，便迅疾遭到反对派中高二适、严北溟、商承祚等人的极力驳斥，他们的总体看法是：东晋时期已篆、隶、真、行、草等五体并行。

2. 石刻尺牍问题。清代阮元曾著《北碑南帖论》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即：“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对此，郭沫若、龙潜、阿英等持否定意见，而高二适、商承祚、周传儒、应成一等均持肯定意见。

3. 南北书风问题。这一问题的具体内容是，南北书风是否截然对立、互不相扰？郭沫若、侯镜昶、马千里等人的答案是否定的，但高二适、严北溟、周传儒等人的答案却是肯定的。

4. 羲之书风问题。郭沫若等人断定，羲之书法风格应有隶书笔意与雄强味道，而没有传世《兰亭序》等行草墨迹那样妩媚；高二适等人则不以为然：“考羲之本属各体皆工……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

5. 隶书笔意问题。这一问题内结三个链环——什么是隶书笔意？羲之书体是否具有隶书笔意？《兰亭序》帖是否具有隶书笔意？论辨双方就此进行的争论亦相持不下、各执己见。

6. 真迹创作问题。郭沫若“直捷了当地说：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了。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高二适、周传儒等则说，神龙《兰亭》既非智永所书，亦非真迹，它是“下真迹一等”的一个模本。而唐兰通过周密考证又得出神龙《兰亭》原系明人伪造的结论。

7. 真迹下落问题。关于《兰亭序》真迹的最终下落，唐人何延之与刘餗都作了较早而不同的详细记载，但它们究竟有多少可靠性？论辨双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亦异见纷呈：或以为“何实刘虚”，或以为“何虚刘实”，或以为“各有部分真实”，或以为“二者皆不真实”，或以为“二者皆有实据”，等等。

8. 后人摹临问题。今传《兰亭序》众多刻本及墨迹本,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真迹之面目?一种意见是各种传本均间入了后人之法与后人之意;另一种意见则是有的传本失真、有的传本近真或“只下真迹一等”。

9. 智永依托问题。郭沫若于1965年提出《兰亭序》书法系隋代智永和尚依托的观点之后,立即遭到高二适等人的强力驳难。经过多年时间的反复思考,郭沫若终于感到自己的观点确立理由不足,所以在1972年之际便来个改弦更张,对自己的前说加以修正,推算是唐太宗李世民直接命令手下重臣进行依托的。

10. 帖本价值问题。大约自元代始,《兰亭序》即被推崇为“天下第一行书”,此说是否契合史实?今传各种摹刻、墨迹帖本价值又如何?这些问题在论辨双方中看法亦不一致:有的认为“天下第一”说是实事求是的,有的则不以为然;有的认为各种摹刻、墨迹帖本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的持论却恰恰相反;也有的主张对此当作具体分析,有好有差,切不可一概而论。

兰亭论辨从其展开之际开始,即形成对立分明的两大基本阵营,或对《兰亭序》从文到帖予以彻底否定,或对《兰亭序》从文到帖予以充分肯定。像郭沫若、宗白华、王一羽、龙潜、启功、于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路(甄予)、史树青、伯炎甫、阿英、张德钧、逯钦立、张润民等都站在否定派阵营一方;至于高二适、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章士钊、黄君实、姚述、金尧如、周汝昌、徐复观、侯镜昶、丁灏、喻衡、熊秉明、周传儒、朱铸禹、黄任轲、翁鼐、庾人俊、马里千、刘开扬、许庄叔、应成一、许伯建、周绍良、刘汉屏、黄文宽、沙孟海、钱钟书、刘家骥等皆一律坚定地站在肯定派阵营一方。由此可见,不管是否定派还是肯定派,阵营都极其庞大,二者短兵相接、互为消长,从而形成我国学术史上空前壮观的百家争鸣之局面。然而,兰亭论辨双方基本立场的对立,又并不排斥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取得共识,这样,如下的奇特情形便出现了——同一阵营意见产生分歧,而对立阵营却能保持观点一致。例如,赵万里不同意郭沫若说《兰亭序》系智永伪托;高二适认为两汉魏晋碑刻无行草而侯镜昶却根据曹操墓砖有大量行书字迹之事实予以了反驳;郭沫若和刘开扬都主张《临河序》是王羲之序文

原题；徐森玉和商承祚都提出东晋时篆、隶、真、行、草五体俱备的看法，等等，不一而足。

一般碑帖考据，往往仅限于考据学一端，有的甚至流于繁琐考证，反使问题愈加模糊。值得高兴的是，1965年以来的兰亭论辨并未沦于这一地步，它的展开模态表现为多学科与多视角的综合交织。就文章论争而言，大家除主体运用考据学以外，还注意同时调动版本学、文字学、哲学、宗教学、心理学、伦理学、编辑学、文学、历史学等无数学科的知识积累。

若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兰亭序》的书法论争方面，则又将清楚地看到，大家不仅涉及了书法学中的书家论、书作论、书体论、书风论、书派论、书史论，而且涉及了考古学中的碑、帖、简、牍、器铭等最新实物资料。另外，还有关于比较学、统计学与文化学等新学科原理的积极采揽与化用。史树青和熊秉明为论证各自观点，都把神龙《兰亭》中的若干字同智永《真草千字文》中的同字进行了比较；喻蘅《从怀仁集〈圣教序〉试析〈兰亭序〉之疑》，便是根据怀仁《圣教序》对羲之书迹集摹途径四个方面的分析统计，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怀仁集碑虽博采王帖，但其主要的依据则是《兰亭序》”；应成一受文化学中的“三论”（独立发明论、传播论、辐辏论）学说之启发，写就长文《从社会文化发展观看〈兰亭序〉书体发生并存在于东晋时代的可能性》，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以为当时客观环境非不可产生如《兰亭序》之作品，非敢作证《兰亭序》传世本之真确铁案难移也。”

正是凭赖如上所述之多向思维起用、无数学科交叉、实证推理并举与宏观微观兼顾的新型学术研究方法，兰亭论辨终于最大限度地创获了它的丰硕果实。这在我们看来是具有极其重要价值的，它无论是对当代书法理论研究还是对当代其他人文学科研究，都将发挥积极而巨大的成果借鉴与方法论启示作用。

兰亭论辨的中心论题是《兰亭序》文帖是否全部出于王羲之之手，但由于受到时代久远与史料芜杂等各种客观条件制约，论辨双方短时间内还很难取得一致意见。要取得一致意见，看来还需等到日后更多地下实物资料的出土才行。好在论辨双方围绕中心论题，既立足于本学科，又横跨其他学科，提出和解决了诸多相关书学论题，

使兰亭论辩达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高度。换言之,1965年以来兰亭论辩的突出贡献,并不在于解决中心论题,帮助我们辨明《兰亭序》从文到帖是否出于王羲之之手,而在于提出和解决了诸多相关书学论题,铸就中国书学史上的一大丰碑,其意义显然是深刻和多方面的。

首先,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王羲之这位书法巨擘的生平阅历、政治抱负、宗教信仰、哲学思想、道德品质、处世性格、审美取向、艺术禀赋、文学修养、学书历程、书法渊源、书法本来面目、推陈出新精神、对后世及异邦的深远影响,以及在中国书法史上所占据的崇高地位。

其次,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东晋时代书法的基本面貌:究竟是尚处于隶书体段,还是早已篆、隶、真、行、草诸体皆备?在了解这一问题之后,很自然地又会帮助我们进一步弄清中国书法的发展脉络,为尽早编写出一部翔实完备的《中国书法通史》打下可靠基础。

第三,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东晋思想史的某些情况。如果《兰亭序》文章出自羲之手笔,那我们就能从中一窥东晋士人及上层官僚对现实生活的处置态度、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对国计民生的忧虑关心、对风度才华的热烈追求以及对宗教世界的痴迷神往等等;如果《兰亭序》文章非王羲之所作,那东晋思想史恐怕就会呈现另外一种全新的情形。

第四,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东晋文学史的基本风貌。以肯定者的眼光视之,《兰亭序》文章骈散交织、情感郁沛、风格鲜突,思想性与艺术性达到完美统一,堪称东晋文学史上的一篇典范性作品;而要转到否定者的立场,则东晋文学史的基本风貌必将与《兰亭序》之文迥然有异。

最后,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东晋前后文字演变的情形、规律与原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晋前后篆、隶、真、行、草五种字体更嬗转换的具体时间、相互关系及内外诱发因素等,都可在兰亭论辩的一些文章中找到富于启迪性的初步答案。

1965年以来的兰亭论辩虽有其深刻独特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失误。这些失误,粗略

说来有如下三点：其一，一方观点矛盾，对方往往只盯住其中一面，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另一面，郭沫若曾抽象地声明自己“没有意思推翻王羲之的地位”，认为《兰亭序帖》的“书法价值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但在具体的论述方面却恰恰相反，肯定派论者正是从郭沫若的具体论述方面得出郭沫若是“连根铲大王”的结论的——此一是非，孰能断哉？其二，前提不一，互相扯皮，对“隶书笔意”的理解与界定最为突出。郭沫若、启功、高二适、商承祚、黄任轲、翁鼐等都各以己意作了相近或相反的定义，然后又在自己的定义前提下驳斥对方论点，显然，这样的交锋带有极大的游移性与错位性，实质上并没有做到正式交锋——如此下去，何结果之有？其三，证据伪讹，结论妄存。这里且引侯开嘉与翁鼐两人的两段文字以证之：“郭沫若从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王羲之的《兰亭序》的真伪，射人先射马，就把矛头直指最有名的《兰亭序》神龙本，断定这是智永所书，真正的王字应与王谢墓志的字体相近。高二适为维护‘书圣’的历史地位，力辟郭说，认定《兰亭序》神龙本是属于王羲之字体无疑的……1983年《书法》杂志发表了唐兰《神龙〈兰亭〉辨伪》一文，文中经过严密考证，论据充分，信而有征，结果《兰亭序》神龙本原是明人所伪造。如果这是确凿的话，那么郭沫若攻击的对象就找错了，高二适维护的对象也找错了，王羲之还是历史上的王羲之”（文见《美术史论》1988年第2期）；“现存的兰亭帖本本来就不是王羲之的真迹……把本来不是真迹的东西拿来当真迹论证，这倒是恰恰在制造问题了。要临摹本来负担真迹的责任，实在是不必要的，也是无补于实际的事”（文见《书法研究》1982年第1期）——这样，岂不是老结未解又系新结了么？好在这些问题与兰亭论辨的巨大成就相比，毕竟属于区区微瑕，我们之所以在此特意指出，无非也是希冀兰亭论辨的后来者们予以必要的重视，汲取教训，以免重蹈如上所述之覆辙。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兰亭论辨的辉煌终以第二次高潮的缓缓退落而逐渐黯淡下来。大约到1982年之后，虽然每年或数年都有若干兰亭论辨文章零星见诸各大报刊，但已明显不成气候（其中有的文章方法陈旧、学术水平甚低；有的文章起点甚至远远落后于60年代中期——主要表现为依然纠缠兰亭帖本近真问题），

其书学论坛的盟主地位,正在为日益壮大的书法美学研究以及相继掀起的书法创新研究、书法批评研究与书法学学科研究等无情取代。因此,我们在1986年山东召开的全国书学讨论会上,便再也没有看到一篇兰亭论辨文章的露面,更谈不上像五年前那样被单独列为一个专题小组了。看来,兰亭论辨要重振雄风,在近年或若干年后,再度掀起第三次高潮已不复可能,其根本原因在于,第二次高潮的退落迥然不同于第一次高潮的退落。第一次高潮的退落,是遭受政治寒流袭击的结果,人们尚有许许多多要说的话闷在心里没有机会说出来,具体表现为陡落、被强行取消,原因来自外部;而第二次高潮的退落则原因来自内部,它表现为被其他新生的理论课题自然取代,是一种缓慢的、本体的退落,完全顺合我国当代书学理论发展的逻辑规定。鉴于此,我们既为兰亭论辨的辉煌感到欣然,也为兰亭论辨的衰落感到释然——兰亭论辨毕竟不同凡响,完成了它的伟大使命,在我国书学史上抹下了浓重的一笔。

(附记:本文曾发表于《书法研究》1994年第4期,收作本书“代自序”时,仅对个别史实予以订正。)

毛 万 宝

2011年2月于

兰亭书法研究所

目 录

1965 年以来兰亭论辨之透视(代自序)	1
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郭沫若)	1
《兰亭序》的真伪驳议(高二适)	29
《驳议》的商讨(郭沫若)	39
《兰亭序》与老庄思想(郭沫若)	50
论《兰亭序》的两封信(宗白华)	55
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唐风)	57
从东晋书法艺术的发展看《兰亭序》真伪(严北溟)	66
申论《兰亭序》真伪(张德钧)	75
《兰亭序》“依托”说的补充论辨 ——与严北溟等先生商榷(张德钧)	82
《兰亭序》真伪问题(中国香港·姚述)	93
《兰亭序》与儒佛道孰近(中国香港·金尧如)	101
柳子厚之于《兰亭》(章士钊)	111
《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启功)	115
揭开《兰亭序帖》迷信的外衣(龙潜)	121
《兰亭序》并非铁案(于硕)	128
王谢墓志不足证《兰亭帖》出于伪托(许伯建)	136

《兰亭序》真伪的我见(徐森玉)	142
东吴已有“暮”字(于硕)	153
从字体上试论《兰亭序》的真伪(赵万里)	155
从《萧翼赚兰亭图》谈到《兰亭序》的伪作问题(史树青)	158
从晋砖文字说到《兰亭序》书法	
——为郭沫若《兰亭序》“依托”说做一些补充(阿英)	167
《兰亭》辨伪一得(伯炎甫)	173
《兰亭序帖》辨妄举例(李长路)	177
《兰亭》辨妄举例小补(李长路)	196
王羲之《兰亭序》真伪辨(中国香港·黄君实)	200
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商承祚)	224
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郭沫若)	245
《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高二适)	251
东晋字体没有脱离隶书笔意(王一羽)	256
《兰亭》综考(周汝昌)	261
晋代书体与《兰亭序帖》(马里千)	284
《兰亭》争论的检讨(中国台湾·徐复观)	293
论钟王真书和《兰亭序》的真伪(侯镜昶)	320
从近年出土文物来看《兰亭序帖》的真伪(阎孝慈)	330
从出土文物看《兰亭序》的真伪(刘家骥)	334
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一个假定(熊秉明)	337
从怀仁集《圣教序》试析《兰亭序》之疑(喻衡)	344
《兰亭序》真伪考(周绍良)	353
论《兰亭序》的真实性兼及书法发展方向问题(周传儒)	370
《兰亭序》再议(朱铸禹)	397
从社会文化发展观看《兰亭序》书体发生并存在于东晋	
时代之可能性(应成一)	405

关于晋朝的书体问题(庾人俊)	429
《兰亭序》之管见(翁 熙)	442
论《兰亭》书体(刘汉屏)	454
关于《临河序》和《兰亭集序》(刘开扬)	483
《兰亭序》是王羲之作的不是王羲之写的(逯钦立)	490
略论王羲之的思想与书风	
——兰亭论辨之续(李长路)	498
兰亭咏史论书篇(李长路)	503
《世说新语》与《兰亭序》(黄文宽)	510
我对《兰亭序》真伪的看法(冯光仪)	515
亦论《兰亭序》之真伪(张润民)	519
从《晋书》的编纂看《兰亭序》的真伪(日本·清水凯夫)	526
再论王羲之对《兰亭集序》的著作权无可怀疑(钟来茵)	537
关于《兰亭序》真伪的两个新疑问(祁小春)	548
《兰亭序》证伪(吴鸿清)	562
《兰亭集序》真伪问题的再思考(顾农)	572
编后记	581

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

郭沫若

一、王兴之夫妇墓志

近年,在南京郊外及其近境出土了几种东晋时代的墓志。就中以《王兴之夫妇墓志》与《谢鲲墓志》,最有史料价值。

《王兴之夫妇墓志》,以今年(1965年)1月19日出土于南京新民门外人台山,一石两面刻字。一面的刻字是:

君讳兴之,字稚陋。琅耶(玳)临沂都乡南仁里。征西大将军行参军,赣令。春秋卅一。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杨建康之白石,于先考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特进卫将军、都亭肃侯墓之左。故刻石为识,藏之于墓。

长子闾之。女字稚容。

次子嗣之,出养第二伯。

次子咸之。

次子预之。

另一面的刻字是:

命妇西河界休都乡吉迁里,宋氏名和之,字秦赢,春秋卅五。永和四年十月三日卒。以其月廿二日,合葬于君柩之右。

父哲,字世俊,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秦梁二州诸军事、冠军将军、梁州刺史、野王公。弟延之,字兴祖。袭封野王公。

兴之虽未着姓,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同志们考证为王彬之子,是确切不可易的。《晋书》卷七十六《王彬传》云:“彬字世儒,……与兄虞俱渡江。……豫讨华轶功,封都亭侯。……苏峻平后,改